

強烈的批評態度，1991年烏克蘭獨立後，這種說法成了烏克蘭官方歷史的一部分。最後，本章要探討為甚麼人們選擇負面的事件來創建集體記憶。本章旨在幫助理解社會主義制度下饑餓問題的政治化，並在民族認同問題上去神秘化。

饑餓問題的政治化和民族主義

歷史學家詹姆斯·維農認為，我們不應該對饑荒的受害者給予當然的同情。他在《饑餓：當代的歷史》(*Hunger: A Modern History*)一書中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後期，馬爾薩斯認定饑荒是資源有限而人口不斷增長的自然結果，大部分人接受這種看法。而且，宗教上認為饑荒是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當時，要走出馬爾薩斯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但是現代媒體把饑餓呈現為新聞，尤其是對於英國中產階級讀者來說更是這樣。饑餓成為以數字表達的人道主義關切只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裏的事。此外，民族主義加強了饑餓問題的政治化。「饑荒成了愛爾蘭和印度民族主義者用來指責英國統治者不人道和無能的武器：英國承諾的是自由貿易、繁榮昌盛、文明發展，而帶來的卻是饑荒和瘟疫……饑荒強化了那些遭遇者的道義資本；殖民時期無法解釋的饑荒是對貌似存在的全球性古典政治經濟的嘲弄。民族主義利用饑荒批評殖民統治變成了一種主權訴求：他們用文件記載集體遭遇的方式，創建一個民族的存在。」³ 1879至1902年之間，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1,220萬至2,930萬印度人死於饑餓。⁴當時，英國官員如印度總督喬治·納塔尼亞·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就聲稱，印度自然災害頻繁、人口增長過速，發生饑荒是不可避免的。但印度經濟界的智囊們反駁這種說法，並且在辯論中獲勝。對貧困和饑荒問題的辯論從自然條件愈來愈多地轉向政治經濟方面。⁵最近，歷史學家麥克·戴維斯甚至發展為稱這些饑荒為「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屠殺」，將其歸咎於英國放任的自由主義政策，及在19世紀後期對艾爾尼諾現象所造成的氣候變化無能為力。⁶戴維斯的書對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提出了論戰。

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對1846至1850年愛爾蘭饑荒的民族主義式的解釋。這個饑荒是幾年的土豆病蟲害和糧食欠收引起的。當時，愛爾蘭大部分勞動階層的日常飲食幾乎完全依賴土豆。如在很多其他情況下一樣，饑荒是否會造成大規模餓死人現象以及成千上萬人死亡，政府的反應是關鍵的因素。饑荒發生時，愛爾蘭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議會，由設在西敏寺的英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饑荒期間還從愛爾蘭向英格蘭出口糧食，同時又從印度進口玉米供應愛爾蘭挨餓的老百姓。可是，習慣吃土豆的愛爾蘭農民不知道怎麼能最好地食用印度的玉米。⁷英國政府的救災援助項目集中於提供就業的公共工程，臭名昭著的工廠被用作養活和「教育」窮人的場所。事實證明這個機制無效之後，為了防止大批人餓死，以約翰·羅素爵士(Sir John Russell)為首的英國政府在1847年3月設立了「供湯廚房」，為300萬愛爾蘭人提供飲食。那一年的秋天，英國政府宣佈饑荒高峰期已過，關閉了所有的「廚房」。當時，傳染病已經開始蔓延。英國報章將救災援助描述為無底的黑洞，政府的高級官員將饑荒的發生歸咎於愛爾蘭農民懶惰、愛爾蘭地主不願把農莊現代化。提出愛爾蘭應該能夠主要依靠自救。⁸英國政府雖然沒有忽略饑荒，但是沒有把救災列為優先項目。英國政府用於救災的資金淨額為700萬英鎊。與拯救饑餓的愛爾蘭人相比，1830年代英國政府為取消西印度的奴隸制，向奴隸主支付的補償費則是2,000萬英鎊。⁹饑荒使愛爾蘭人口減少了20%至25%，在1845至1851年間，110萬到150萬人死亡，另有210萬人移民海外。¹⁰

對愛爾蘭人敘述的研究表明，饑荒之後在很多國家，人們以及天主教的牧師們把這個饑荒解釋為「上帝的意旨」。¹¹但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把饑荒政治化，這個事件在他們的敘事中有著突出的作用。¹²比如，一位著名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約翰·米切爾(John Mitchel)在他流放美國期間撰寫、1861年出版的書籍《聖戰時期和對愛爾蘭最後的征服》(*The Crusade of the Period and Last Conquest of Ireland (Perhaps)*)中，把英國政府描述成無知、無能，並認為英國政府把饑荒作為征服愛爾蘭民族的武器。當時愛爾蘭的牲畜和小麥都在向英國出口，而英國政府從印度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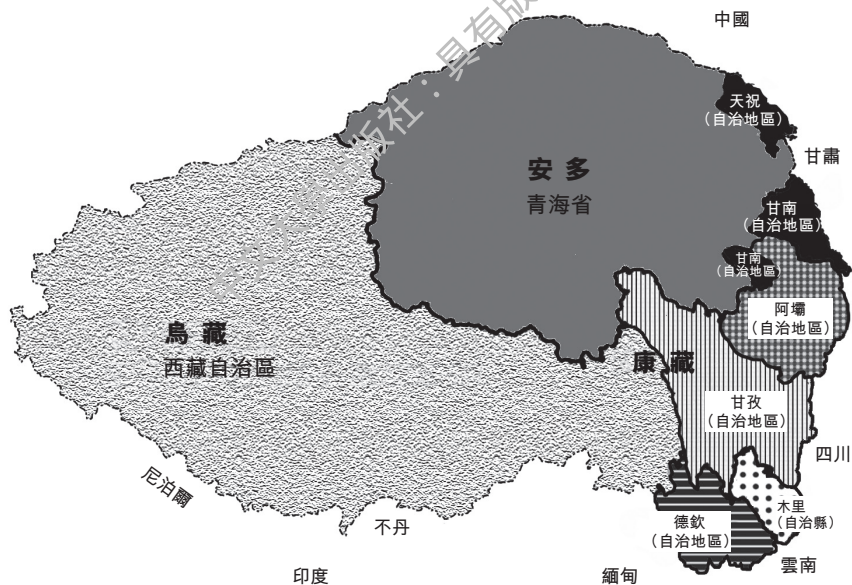
愛爾蘭運進玉米只是為了掩蓋英國仍然一如既往從愛爾蘭抽取進貢的事實。米切爾估計死亡人數為150萬。他得出那個著名的結論：「他們（指愛爾蘭人）在自己親手創造的富裕中餓死……我稱其為人為的饑荒，就是說，這個饑荒使一個富裕而肥沃的島嶼變得荒涼，而這個島曾年年物產豐盛，養育着它所有的人民以及其他的人……不錯，造物主送來了土豆病蟲害，但是英國人製造了饑荒。」¹³這段充滿激情的話變得流行起來，因為它使人們的遭遇有了某種意義。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將注意力集中於加害者之類的外部因素，而不是愛爾蘭社會秩序的崩潰和所有其他災難性的後果，如犯罪率增高、賣淫氾濫和自相殘殺。以這樣的說法劃線，將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說成受害者，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說成加害者，而不是去瞭解真相，即很多信奉天主教的地主和主要佃戶也利用饑荒掠奪貧窮農民的土地。此外，烏爾斯特附近的新教地區也遭遇了饑荒。歐·格拉達認為，在饑荒時期沒有甚麼人是清白的，因為自己的生存就意味着他人的犧牲，一般來說犧牲的是社會上的弱者。¹⁴除了這些矛盾之處之外，正如彼得·格雷（Peter Gray）所說，饑荒是人為製造的敘事，「滿足了饑荒後新生代的心理和政治需求」。¹⁵尤其是對移居美國的愛爾蘭難民來說，民族主義敘事可以讓他們在敵對的環境中保持愛爾蘭人和天主教徒的身份認同。民族主義者指責信奉基督教的英格蘭強迫他們背井離鄉。流行歌曲和民謠號召人們高舉綠色大旗，為大規模餓死人事件與英國人鬥爭，以報仇雪恨。¹⁶愛爾蘭後來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都嚴重依賴旅美愛爾蘭僑民的支持與資助。雖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大部分饑荒的親歷者都已過世，但是歌曲、民謠和報刊文章使在美的450萬愛爾蘭僑民保留了對饑荒的集體記憶。¹⁷

20世紀初以後，對饑荒的集體記憶在愛爾蘭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是，1995年紀念饑荒150周年時，愛爾蘭政府資助成立了國家饑荒紀念委員會，這時，趨勢又開始變化。¹⁸北愛爾蘭親英的黨派和英格蘭的保守派擔心紀念饑荒的活動會有助於愛爾蘭共和軍。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首相在饑荒150周年紀念活動時承認英國政府在饑荒中的作用並正式表示遺憾，這在英國和愛爾蘭受到廣泛批評，人們認為此舉大可不

必。¹⁹愛爾蘭總統瑪麗·羅賓遜 (Mary Robinson) 夫人在紀念活動的講話中沒有用饑荒挑起反英情緒，而是強調愛爾蘭人應該因自己的經歷同情發展中國家正在經受饑餓的人們和難民。²⁰

我之所以提到愛爾蘭饑荒對民族主義者的重要性，是因為這與烏克蘭和西藏的情況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社群的旅外僑民都形成了這樣一種敘事，即佔領者有意製造饑荒，以打擊和毀滅他們的民族。饑餓的經歷被用作劃分種族的界限，以表明有必要爭取民族獨立，防止這種災難再次發生。在所有這三種情況下，民族知識分子主導了集體記憶的構建，而不是農民。

圖 7.1 西藏流亡政府劃定的西藏疆域



饑餓與西藏的民族主義

西藏流亡者和中國政府都利用撰寫歷史來建構民族身份。隨着1980年代以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學術論著的目標是面向西方讀者，旨在為西藏獨立爭取支持。自1988年，十四世達賴喇嘛一直在推動建立與中國具有聯合關係的西藏自治，但達賴喇嘛所要求的自治迄今未被中國政府接受。²¹為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達賴喇嘛創建了一種反駁中國官方版歷史的民族主義的說法，西方媒體常常不作任何審核地對此加以引用。

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設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很多學者認為，西藏人在1951年以前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是在流亡期間發展起來的。「按班萊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漢人進入西藏、藏人在漢人統治下共同的遭遇以及被迫流亡的經歷使他們『想像』自己是西藏人，而不是康巴人、安多人、果洛人等等，而且這也使他們能夠把西藏高原上其他遙遠地區的人們看作同胞。」²²西藏流亡政府建構了具有宗教象徵的世俗的民族主義。每年流亡政府都要在3月10日，即1959年起義的日子，組織一個全民族的紀念活動。在學校以雪山獅子旗等象徵為基礎進行民族主義教育，強制唱頌西藏國歌。推動民族主義的行為還包括指定西藏中部拉薩方言為官方語言，推動族內通婚和高生育率。同時，流亡政府不鼓勵藏人與印度當地人同化。²³

西藏流亡政府對西藏的定義與中國政府的定義大相徑庭。中國政府將西藏定義為1965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西藏流亡政府稱這個地區為「烏思藏」(又稱「前藏」，中國清朝以後稱該地區為「衛藏」——譯者註)，是傳統的拉薩和達賴喇嘛的封地。(以下所用「西藏」一詞指的是西藏自治區。)與北京不同，西藏流亡政府所定義的西藏是所有有藏人居住的地區或者叫「大藏區」，包括康區和安多地區。這兩個地區位於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省。「大藏區」佔全中國約四分之一的領土，在這個地區，藏族人不到全部人口的一半。康區在清朝時已於1728年併入了四川。²⁴但西藏流亡政府杜撰了一個故事，即共產黨為了打擊藏族

人將西藏分成了五個省。流亡政府所宣傳的「中國統治」的受害者包括安多和康區的藏人。與烏克蘭饑荒的情況一樣，銘記所有藏人的遭遇是為了建構一個民族以及民族身份。

主要的敘事：「漢人來到之前西藏沒有過饑荒」

在西藏民族主義者建構的歷史中，「漢人統治」之下西藏人所經受的遭遇是一個重要的部分。這種敘事的中心內容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他1962年的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所提出的觀點。這本書關鍵的論點是，西藏人簽訂「十七條協議」及與漢人合作是被迫的。在該書所稱的「非法佔領」後，西藏成了中國的殖民地。達賴喇嘛在流亡的政治生涯中指責中國政府進行「大屠殺」、「種族滅絕」、「強姦西藏」和「文化種族滅絕」。²⁵他認為發生在烏思藏、康區和安多地區的饑荒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統計是，在1949至1979年間，中國的「佔領」造成120多萬西藏人死亡，其中342,970人餓死。具體的統計數據是，烏思藏餓死131,072人、康區89,916人、安多地區121,982人。²⁶並聲稱另有68萬藏人死在抵抗漢人的戰鬥中或者被處決，這個數字也無法核實。而根據中國官方後來公佈並在出版文獻中加以引用的數據，1959至1961年，只有93,000個藏族「叛亂分子」死傷或被捕。²⁷當時西藏地方政府仍然有自己的軍隊，有幾千個游擊隊員在山上堅持戰鬥。

在1962年的自傳中，達賴寫道：「首先，儘管我們的領土很遼闊，但只有700萬到800萬西藏人，而漢人有6億……他們常常有饑荒，需要西藏來擴大他們的生存空間。實際上，他們已經在西藏安置了很多漢族農民。我毫不懷疑，他們指望將來有一天在西藏，藏族會成為無足輕重的少數民族。與此同時，藏族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比佔領者——漢族農民的條件差。在西藏有記載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過饑荒，但現在發生饑荒了。」²⁸而與此相反，中國的統計數據則顯示，1953年全中國藏族人口只有275.3萬，1964年為250.1萬。²⁹達賴喇嘛使用的語言讓人想到冷戰中預言「黃禍」將滲入並征服歐美大陸的反共語調。儘